

日本东、西两京东洋法制史学的“双子座”

赵晶

虽然冈野诚先生与寺田浩明先生的荣休并不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结，但诚如滋贺先生所言“某种科学要在学术界确立地位，为世人所承认，必须在大学里正规地系统地讲课”，可以在日本的大学中执掌教鞭的东洋法制史学者的人数，无论是对其师门的学术传承，还是对整个学科的未来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笔者衷心希望日本的东洋法制史研究（尤其是唐代法制史）能够后继有人、生生不息。

今年3月底，冈野诚先生与寺田浩明先生将分别从明治大学法学部和京都大学法学部荣休，这意味着日本“第五代”东洋法制史学者基本退出高等教育第一线。多年来，笔者从两位的论著中获得极大教益，也曾得到他们的诸多关照，谨作此文，以为纪念。

共同的学术渊源

之所以将他们两位定为“第五代”，是因为从学统师承而论，他们皆可追溯至近代日本第一代法制史学者宫崎道三郎先生（1855—1928）。宫崎先生虽以日本法制史为业，但兼及东洋法制，这一治学路径为他的学生中田薰先生（1877—1967）继承。

中田先生于1911年自德意志留学回国，受聘为教授，执掌东京帝国大学“比较法制史”讲座（该讲座于1916年改称“西洋法制史”）；在宫崎先生1922年荣休后，又接掌“法制史”讲座（该讲座于1954年改称“日本法制史”），于任教岁月中培养了在东洋法制史、日本法制史领域各擅胜场的仁井田陞先生（1904—1966）和石井良助先生（1907—1993）等。日后在东洋法制史领域成果甚夥的滋贺秀三先生（1921—2008）出自石井先生门下，而寺田先生又是滋贺先生的得意门生。

冈野先生的恩师岛田正一郎先生（1915—2009）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于1939年4月至1941年6月留学北京（《岛田正一郎博士略歴》，《東洋法史の探究——島田正一郎博士頌壽記念論集》，汲古書院1987年，

第3頁），受教于当时以伪满洲国总务厅特约人员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特约人员的身份同在当地的泷川政次郎先生（1897—1992）（《泷川政次郎博士略年譜》，《律令制の諸問題——泷川政次郎博士米壽記念論集》，汲古書院1984年，第3頁）。二人虽然在北京共处的时间只有数月，但不仅合作撰写了《辽律之研究》（1944年）一书，而且还缔结了一生的师生之谊。泷川先生于192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受教于中田先生。

因此，如果将中田先生算作第二代、仁井田先生与泷川先生算作第三代、滋贺先生与岛田先生算作第四代，那么冈野先生与寺田先生不但分属同门，而且辈分相当，是为第五代学者。

更有意思的是，1926年中田先生曾应《国家学会杂志》之邀，为中田先生的《法制史论集》第一卷撰写书评，因语涉驳议，不仅书评被退稿，而且还收到了乃师送来的“破门状”，由此交恶（泷川政次郎：《日本法制史》上《学术文庫〈日本法制史〉序》，講談社1985年，第5—6頁）。此后，泷川先生与中田先生的高足仁井田先生在许多领域都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论辩，如有关唐令与唐式的区别问题，双方观点针锋相对，行文不乏意气之辞（参见泷川政次郎《唐兵部式と日本軍防令》，《法制史研究》第2号，1952年；仁井田陞：《唐軍防令と烽燧制度——泷川博士の批評に答えて》，《法制史研究》第4号，1954年），颇有师门恩怨夹杂其中之嫌。无独有偶，仁井田先生与师侄滋贺先生之间也爆发过是否坚持中田先生的唐宋家产共有制论的论战，滋贺先生反对师祖之说，由此触及曾

▶ 近代日本第一代法制史学者



宫崎道三郎（取自《宫崎先生法制史論集》，岩波書店1929年）

◀ 第二代



中田薰（取自《法制史研究》第18号，1968年）

第三代



仁井田陞（取自仁井田陞《東洋とは何か》，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



泷川政次郎（取自《律令制の諸問題——泷川政次郎博士米壽記念論集》，汲古書院1984年）

第四代



滋贺秀三（取自滋贺秀三《続 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創文社2009年）



岛田正一郎（取自《東洋法史の探究——島田正一郎博士頌壽記念論集》，汲古書院1987年）